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Thirty Years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公明◎著

2489193



Thirty Years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李公明◎著



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01605102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李公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802-2

I. 在… II. 李…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2336 号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李公明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361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802-2/C · 190

定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大学时

30

THIRTY YEARS / Li Gongming

李公明



1979年,大学二年级赴广西考古实习
(前排左一为作者)



1988年4月,其时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正热切讨论中国问题

30
THIRTY YEARS LI Gangming
李公明



1999年9月，“大地行”摄制组向珠峰进发



2000年2月1日，在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
采访土著艺术中心

30

THIRTY YEARS / Li Gongming

李公明



2007年10月参加牛津大学阿什莫里恩博物馆主办的
中国现代版画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会议发言



2007年策划、实施到广东阳江地区农村绘制“新宣传画”

30

THIRTY YEARS Li Gongming
李公明

自序：阅读与写作是为了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

李公明



阅读与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古今中外已有无数学者和读书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我也时常问自己。答案当然是各不相同，正如每个人的阅读与写作各有自己的取向与追求。在编选这本文集的时候，这个问题更使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

在我看来——或许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看法，阅读与写作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更是属于社会、属于时代的；我们每个人的心路历程无不印刻在时代中国的风雨路途上。三十年的热切讨论、三十年的风雨兼程，难道不就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吗？

1978年初春，我在公社招生办拿到华南师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后，第一个冲动就是马上回广州买书。在北京路工具书店买到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历史学著作，这批书中有些在当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如：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上、下，三联书店1978年版）、马里欧特《现代英国》（全三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印度通史》（全四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P·E·N·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伊萨特·阿尔-努斯等《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三联书店1974年版）、埃·邦儒尔等《瑞士简史》（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还有一部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中选编的《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上、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实际上，即便在今天，像中非史、西非史、叙利亚史等这些国别史都是极为专门的，在号称“学术繁荣”的今天大概也不会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书。

在历史系读书的四年中，这些国别史未能引起我多大的研究兴趣，但是它们却以历史的角度为我切开了一条通往意识形态思考的幽暗小道——这是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最重要的收获。比如，《现代英国》第一篇的“前言”，短短的两三千字，其中谈到的科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民主政治的发育过程、官僚政治与官方表述的关系、政治制度输出的弊端等，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恐怕还是很多文科教授也没搞清楚的。现在回想起来，思想启蒙与政治觉醒的最坚实的路途可能就是历史学，因为历史真相的“去蔽”功能可以戳穿意识形态的谎言。

在那批书中,读的最多,也是在当时流传最广的是三位美国学者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该书原是1932年出版、在美国大学和中学广泛使用的教材,中文版据1941年的修订本翻译。虽然已经是三十年前的知识水平,但当时却是我们学习世界通史很合适的向导。即便今天来看,这本通俗性的入门读物对于大学生来说仍很简明、生动,并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例如它对“罗马的道路”的货币史介绍:“它所铸造的最初的银币,大约在公元前269年,跟着这些道路,这些贸易的路线,分布出去,刺激了商业。”(上册,第207页)今天查英国学者琼杰的《世界铸币百科全书》,罗马第一次铸造的银币ROMANO就是在公元前269年。接着它还说:“罗马的第一个剧作家就是从塔兰托沿着著名的亚庇乌斯大道带到罗马的俘虏。”这在戏剧史著述中恐怕也是不易查找到的。更有意思的是该书的中文版出版说明,花了大部分篇幅批判该书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但是却没有对原书正文作任何“技术处理”,甚至包括对我国边界的画法有严重错误的地图也一律按原图译制。这在当时真是奇怪的处理方法。

在当年国内学者撰写的著作中,我认为很值得讨论的是集体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买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刚学完古代史,在此之前我从系资料室借了吉林师范大学1973年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上册)来读,已经觉得其水平高出其他院校编写的教材。现在这本《史纲》的前言就说它是以吉林的那本为基础,从1974年开始改写。该书于1977年10月完成,书中所引用的国际学术资料竟然截止到1977年6月(见第49页注释^[1]),而且全书引用的当时国际最新学术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所有注释均极为严谨、翔实。从学术资源来看,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1970年、1971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的一、二分册以及各专业课题的前沿学术期刊,如《自然界》、《埃及考古杂志》、《近东研究杂志》等。今天我在讲授世界文化史课程时,仍把这本三十年前国内学者的著作列入参考书目。除了它在专业学习上的参考价值外,我特别要学生思考的问题是:在“文革”时期竟然有这样严谨的学术工作,一是要思考今天“学术繁荣”存在的问题,二是要学习客观、真实地看待即便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学术史的思考。

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启蒙中,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具有通俗的启蒙意义。作者在这本文集中从多种角度介绍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潮、作品和重要作家,该书成为许多大学生了解现代派文学的入门向导。其实,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格局的变化、文化错位等原因就开始翻译出版部分西方现代派文艺和哲学著作,如加缪的《局外

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但是在“内部发行”的严格控制下,这些读物的传播极为有限。当时我们并不清楚现代派文艺进入中国的前史——从五四后已经开始译介西方现代文艺到60年代开始的“内参”文艺,仅是把现代派文艺看作是反对“四人帮”“文革”专制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现象是,当时我们才刚刚开始阅读古典文学名著。1978年5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出售一批新版的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九三年》、《安娜·卡列尼娜》等,进大学没多久的我们,下课后就赶到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由于“拨乱反正”与打开国门的历史进程重叠在一起而造成了文艺阅读思潮的急迫转换和思想“内爆”,我们在极其仓促的阅读中奠定了以思想批判为底色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艺情结。

在陈焜的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基本精神的一个方面》,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论述谈到了对冠冕堂皇的政治与道德的虚伪性的批判,令当时的我们大受震动。在黑格尔看来,拉摩的侄子的自私、卑鄙非但不是堕落,而且是对向国家献媚的和虚伪的“高贵意识”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思想放在今天恐怕也不失其批判的锋芒。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阅读史上,有些概念成为我们的流行词。约瑟夫·赫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使我们对于专制极权的荒诞和专横有了一个贴切的描述语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使“毕巧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也使“英雄”发生了“多余人”的转义;施咸荣译的《等待戈多》(多种版本)使我们对于荒诞和希望的言说有了最简捷的表达。当然,今天流行语的来源已从书籍扩展到影视、网络,而且不乏像“五毛党”、“俯卧撑”这样具有现实讽刺意味的语汇,但从思想上来看都无法与那个时代相比。

读了三十年的书,如何分辨书的好坏,自己觉得还是讲不清楚。偶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最保险的回答当然是:书读多了,对书的好坏自然会有种种分辨的方法和能力。有些真正的读书人书读得多而精,对书的品位要求很高,因而也很挑剔。知堂老人或许可归此类,其《丙戌丁亥杂诗》中有“读书”一首曰:“读书五十年,如饮掺水酒。偶得陶然趣,水味还在口。终年不快意,长令吾腹负。久久亦有得,一呷识好丑。冥想架上书,累累如瓦缶。酸甜留舌本,指愿辨良否。世有好事人,叩门乞传授。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饮了五十年的掺水酒,辨识好丑的能力自然就有了。我辈远未到这种境界,不敢赞一词。但我也有另一个方向的愚笨之得:有些平淡如水的书,在我读来却有了酒味,这当然也可能是由于读书未精的缘故;但是,书无不可读的心态也会

使自己走向宽容与多元,或许这也是读书人困惑中的一丝亮光吧。

那么,读书究竟有什么用?近年来我多次谈到这样一个比喻:读书如磨刀,读完书就要用,不是砍柴就是杀人。当然,所谓的“用”早已不是应付考试,为升职写论文等,而是有大用处——究其实也是大而无用,只是在个人内心觉得有大用处而已。读书如磨刀,刀磨利了,既砍不了柴更不是杀人,而是在内心点燃柴薪,在内心向敌人举起大刀。我曾经“被”开了一个博客,在“左岸看世界”的标题之下的文字就是:读书人是磨刀人。它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更多的时候是无聊而读书,读完自然更是无用。读报也是一样,更多的时候是无聊才读报,但读报之后不开心的时候很多——尽管无用的文字很多,但使人流泪的中国还是会不时在报上披露出它的一角。

读书、读报、写作,就像磨刀和看地形、看天气,好像总在等待着什么、密谋着什么。有一天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红岩》里那个装疯的共产党人华子良喊出的接头暗号:“让我们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读书、读报与写作也好像是一样,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

读书和写作真有那么重要吗?那个“伟大的日子”是指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根本不存在,在我却似乎是无法摆脱。许多朋友的读书、写作、行动,难道不都是为了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而给所有公民锻造思想的武器吗?其实,所谓的“伟大的日子”就是自由交流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拥有人的尊严的日子,读书不就是为这些日子而准备的吗?如果有人说只有“精英”的读书才会这样想,那真是大错特错了。别的不说,我周边许多痴迷读书的朋友都是广州的平民阶层,他们心中所念、口中所言,尤其是对书的选择,没有一样不是与那个“伟大的日子”密切相关的。古人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读书人怎能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人、写作者不就是磨刀人吗?

读书与写作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要付出的代价很多。有形者,如财政的拮据、空间的挤迫、时间精力的耗费等都是显明的代价。无形者就很难说了。有些人一辈子皓首穷经,连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都解决不了,用以前的话来说,就还是“政治上的糊涂虫”;有些人只懂读书而远离了生活中的感性、本能,或以意识压抑身体、以戒律禁锢心灵,最后落得个“市场上的斯宾诺莎”。这都是读书不得法,把人读坏了。

但即使样样都能打起精神,像一只土拨鼠似的在书斋与世界之间东刨西挖,还是会有很多困惑解决不了。比如,我很喜欢一份叫作《民间》(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公民社会中心主办)的学术通讯交流刊物,它的口号是“行动改变生存”,我很认

同。但是,如果有哪位读书人提出“读书改变生存”的口号,我会很怀疑。是的,有很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况,但是作为社会和民族意义上的生存状况,光是读书就无能为力了。这有点像是悖论:行动者应该有知识甚至有学问,但是有了知识和学问的人很少会行动。前两年深圳一个上访的打工者把某政府机关的牌子摘了下来,最后终于讨回工薪。恐怕饱读经济学、法学的读书人就做不出这样的行动、讨不回自己的工薪。因为读书而丧失了行动的本能、本领,这样的代价还不大大吗?

读书就是磨刀,但读书又会使人失去行动的本能。十年磨刀、三十年磨刀,读书人的困惑依旧,读书人的世界也依旧。难道这就是读书人的宿命?

写到这里,那个装疯的共产党人华子良的接头暗号还是值得我们再三回味的:“让我们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读书与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作学问的专精与博杂、作学问与关注现实的关系。检视三十年来的读书与写作,我深感作学问要有真爱和真正的好奇之心、探索之心,不妨有时专精、有时博杂;而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要有真感受、要有最基本的道义之感,不妨有时思考、有时行动。其实,这些问题都与个人的初衷和志趣相关,并无所谓好坏。从本文集中不难看出,我的阅读和写作都是率性而读、有感而作。

由于按年编排,早年的一些很不成熟之作亦选入。无论深浅对错,可以坦承的是,它们都是我心路历程上的真实记录。

最后,根据本文集体例的要求和所选文章的具体情况,作几点编选说明:

一、本文集所收全部为本人独立撰写的文章,并已全部公开发表。有些年份撰文甚少,而有些年份却多有发表,故不执著于每年必录,大体上是每个时期均有代表之作。有些文章的题目在发表时由编辑作了改动,收入本文集的时候作了这样的处理:凡本人认为编辑的改动比原题目更适宜者,以发表的题目为准;如果觉得还是坚持原题更好,则用回原题目,在文后的发表出处注明发表时的题目;个别收入本文集的文章题目增加了副标题,以使题旨更明晰。

二、所有文字不作任何增删修订,只纠正个别的文字或标点符号排印错误,同时把原来各种格式的注释重新作了统一。如在发表时因篇幅等各种原因而由编辑作过文字删改的,在文后的发表出处注明“发表时有删改”。

三、有些文章原发表时附有文中插图或文后附图,收入本文集时因体例关系一律删去,有需要的读者请参阅原出版物。

四、所选文章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包括有学术论文、思想文化评论、书评及散文。由于各种体裁和发表时篇幅限制的不同,所收文章长短不一。所选文章均按写作时的年份排列,但在分量取舍上时有侧重。

2010年12月18日于广州

目 录

自序：阅读与写作是为了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 / 1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关于戊戌变法性质的再探讨 / 2

一九八三

苏仁山的人物画 / 12

一九八四—一九八六

“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代画论 / 15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致七七级同学的信 / 20

一九八九—一九九〇

赶快上路,赶快思——《思·史·诗》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札记 / 23

价值·艺术·社会——贝尔的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问题 / 28

一九九一

地平线上的希望——现代化进程中的比较教育与文化传递 / 35

怀着期望前行——蒂里希的宗教社会主义理论简评 / 42

一九九二

广东美术通史研究札记 / 49

一九九三

“巫”与“礼”研究杂谈 / 67

清初“四王”绘画思想研究——王时敏与董其昌的关系 / 73

一九九四

信仰与腐败——基督教会改革史札记 / 90

明末清初的绘画发展与文化变异之关系 / 98

一九九五

书斋记事 / 110

一九九六——一九九七

战时新生活中的延安农民与地主——古元木刻作品随想 / 113

一九九八——一九九九

床的哲学与文化史 / 116

二〇〇〇

在历史词语密林中的“科学”与“艺术” / 127

大地·吟唱·版图——追寻澳洲土著的“梦幻路径” / 133

二〇〇一

读书人的《读书》与中国——《读书》杂志 20 年评议 / 142

二〇〇二

进行着的世界史——读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 / 151

二〇〇三

“异托邦”：宋庄艺术家群落 / 154

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 / 161

二〇〇四

现代性理论中的极权主义问题——读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札记 / 170

二〇〇五

“阶级”与“怨恨”的图像学分析——以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地主—
农民题材为中心 / 181

二〇〇六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 220

学者与政治权势——读《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 223

二〇〇七

呼唤政治文明与社会正义——看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 / 228

论李可染对于新中国画改造的贡献——以山水写生和“红色山水”为中心 / 234

二〇〇八

现代民族主义研究二题：建构与迷局 / 251

二〇〇九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 260

专制社会下的艺术与激进美学——以 19 世纪法国左翼艺术为中心 / 267

二〇一〇

当代艺术的公共政治视界：艺术机构、艺术家及公众 / 282

附录一：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 296

附录二：主要学术出版物 / 301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纪事

1978年春,作为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学生进入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入学未久,在校园参加军训和农业生产劳动。开始广泛阅读文学、历史读物。由广东省团委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1978年“五四征文比赛”中,播出一篇获二等奖的征文,作者是从化钽铌厂青年工人伍海谷,讲述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如何勤奋读书、考上大学。许多同学、中学老师和朋友都收听了广播。

校园里流传着各种七七级大学生的民办刊物,有《红豆》(中大)、《未来》(华师)、《珞珈山》(武大)等,最有影响力的是由全国十三所学校中文系学生合办的《这一代》(仅出了一期)以及《今天》;阅读和讨论这些刊物,也参与了一些活动。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等著作。

1980年,在当时史学界氛围影响下,比较关注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广东省历史学会召开的太平天国革命研讨会,在会议上发言。赴广东信宜地区,调查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凌十八农民起义军的历史。

在延河文学月刊社主办的《延河》杂志(西安)1980年第4期的“来信来稿摘登”发表一段书评,是为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字;收到稿费人民币5元,同窗好友林伟然戏称“此乃稿费生涯之始”。

1981年春,在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撰写《是改良主义运动,还是革命?——关于戊戌运动性质的异议》和《霍布斯专制主义理论剖析》,被老师推荐提交给华南师范学院三十周年校庆暨第十一次科学报告讨论会历史系分会。毕业论文原写青年梁启超思想研究,后经指导教师提议把戊戌变法一文经过修改后作为毕业论文提交。

1982年1月初,从华师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主要工作是协助陈少丰教授的中国美术史本科公共课教学工作。在读书期间便曾到广州美院协助陈少丰老师进行居廉、居巢的资料调查工作。3月,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进修。6月,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合作的须弥山石窟考察工作队,考察与测绘成果后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须弥山石窟》,1988年9月第一版)。在考察工作完成后到甘肃敦煌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地参观。

毕业论文《关于戊戌变法性质的再探讨》一文发表于《华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3月4日《广州日报》“理论争鸣”版以“戊戌变法不是改良